

九十憶往(二)

王立哉遺著。王志信恭校

在此回憶余從事教育工作時之受業學生，先後考入軍校者，除范煜瑛外，尚有三期之王樹東（名良棻，北伐任營長時陣亡）、王鏡塘。四期之王立亭（名培禮）、李毅民（名慶林）、張邦采（字功亮）。五期之隋金（字貢三，現退役在臺）。六期之丘青萍（名建寅，來臺已故）。八期之王增廉（抗戰時任憲兵營長，作戰陣亡）、張汝淑。

復有高希琪君，友人高石秋之子，係航空學校畢業。二十六年，在漢口時，由學生隋景林陪同到余住處之揚子江大飯店會晤。臨行時稱已購得話劇入場券，請余同去觀賞。余當答以：「離南京時曾誓言，不回南京決不進遊藝場所。」希琪當即含淚曰：「老師！我們幹這種轟炸工作，說不定明天就見不到了！師生分離若干年，見到景林兄才知老師的住處，請老師破一次例罷！」我就說：「不要這樣說法，我去！我去！」不意見面後第三個星期，他就因作戰而殉職。至今憶及，猶覺心寒。

當時共產黨已於北伐軍節節勝利聲中，利用本黨容共政策作掩護，挑撥部分左傾中央委員，以武漢作為活動據點，並組成一個外貌為國民黨

，實質則為共產黨之中央政府，以與在南京由蔣總司令支持之真正國民政府相抗衡。此際校內共黨分子發展極為迅速，僅兩三個月，整個局面全為共黨勢力所控制。其活動之積極，氣焰之囂張，對本黨而言，稱其為喧賓奪主猶有過之。

三次陪決槍斃人犯

時武漢各種黨部為商討武漢黨務推展問題，推派代表，於三月十日在漢口血花世界舉行會議，共商進行。而共產黨徒之工人代表，公然張貼「打倒蔣介石」之標語，被余同隊同學蔡文政發覺，立即將標語撕毀，並毆打張貼標語之工人。許多同學在極端憤怒之下，自動聚集，將該工人捆綁，帶回學校。共產黨徒即慫恿學校當局召開大會，由惲代英主持。會後，由全校同學冒雨將該工人送到江邊。

接着第六隊黨部會議，鬪爭蔡文政。余即以隊黨委員身分解說事件發生經過，並聲言：「工人居然張貼標語打倒我們校長，蔡同學之行動，在維護正義，自屬正當。」會後不到三天，誣告檢舉余之文件，竟達三百餘份，自屬捏造與報復，欲加之罪而已。當由第二大隊隊黨部開會審訊

，最後以極右派罪名，逮捕入獄。余在獄中，堅強不屈，堅決擁護蔣介石總司令繼續領導北伐，俾早完成統一大業。

當時共黨已不顧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革命建國最高原則，遽行發動階級鬪爭，清算武漢政權所控制各地之資產階級。共黨所發動之遊行亦強迫各商號各行業參加；罷工排外，反對南京國民政府之標語，遍布各處；接收工廠、沒收土地、經濟紊亂達於極點。漢口長沙各地每日殺人無算，民心惶惶，氣氛恐怖。幸國民黨多數領導階層，不論中央執監委員，或各省負責同志均已認清共黨獍豸面目、竊奪野心，一致要求南京中央政府迅將所有共黨分子，由國民黨組織中全部清除。蔣總司令遂奉命於四月十二日，首先在上海舉發清黨運動，繼之南京廣州等地亦完全禁止共黨活動。

余在獄中聞已厲行清黨，衷心慶幸不已。而共黨之暴戾行動則更變本加厲。每逢槍斃人犯，即將余拉去陪決。曾三次同被解赴法場，軍威森嚴，生死俄頃，企圖迫余「覺悟」，勿再執迷反對共黨。余既獻身革命，早置生死於度外，當以正義嚴詞與共黨分子相抗辯，彼亦無可奈何。延

至六月間，武漢政權始藉開除黨籍、學籍之處分，迫余離校，並押解出境。而共黨爪牙田裕揚、臧克家、曹肖青、劉鳴鑾、安哲等猶到處搜索，必欲置余於死地而後快。幸經王樂平、朱霽青兩先生運用關係，密搭英輪，潛赴上海。在滬友好方傳余已遇害，于沐塵、陳雪南、范錫三諸兄正在王樂平兄家中集會籌商追悼。以余生還而罷。

由漢抵滬後數日，丁惟汾先生函召余去京，余以身心交瘁，擬稍事休息再行應命。又數日，復派張丕介兄來滬云：丁先生極思瞭解武漢近況，請即去京詳談。到京後，丁先生詳詢武漢情形後，曰：「余現任中央青年部長，尚有一幹事缺，月薪八十元，你明天即可去辦公。」余以心力疲困，待休息平復後再議。越月餘，復電召去京。以中央正籌辦黨務學校，丁先生任訓導處長，谷正綱先生任副處長，設訓育幹事若干人，可即前往任訓育幹事，月薪一百元。余當以曾在張丕介處見到報名冊，有留學生多人報名，故稱以余學識何能勝任！丁先生當謂：「我們是指導黨務，並非一般學識；如按一般學識，我也不能勝任。」余仍固辭。丁先生乃面帶怒容曰：「你這也不幹，那也不幹，到底想作什麼？」

時中央黨部已於十六年六月令委丁惟汾、王子壯、孟民言、于恩波、陳名豫、王立哉、王仲裕、張丕介、梁竹航、殷君采、何思源、張洛書等十三人為山東省黨部改組委員。余當謂黨務工作，中央固然重要，地方亦何能疏忽。余曾聞先生云：中央對山東黨務，每月有二千四百元之補助費，均為先生具領。我們既已被委為山東省黨部改組委員，即應致力於地方黨務之改進發展。

現在雖不能回省公開活動，亦應使用此中央補助費在京覓一房屋，設一辦事處，秘密與各縣市切取聯繫，溝通中央與地方之關係。余情願負此責任。

秘密返魯與敵周旋

丁先生鑒於余之不就青年部兼黨務學校幹事（月薪一八〇元），並非嫌待遇低，乃同意余之建議：租得大紗帽巷房，成立駐京辦事處，由余負責，月給津貼壹拾伍元；設工友一人，月支捌元。並依中央頒布之組織大綱，成立改組委員會，暫設秘書處、組織部、宣傳部。秘書處由委員三人組成之，組織、宣傳兩部各設正副部長各一人；由秘書及部長組織常務委員會。推王子壯、王立哉、孟民言為秘書；王仲裕為組織部長，張洛書副之；何思源為宣傳部長，張丕介副之。辦事處秘密與各縣市切取聯繫。多數縣市均推派代表，

如魯西南之負責同志滕蒙園、劉文彥等，均繞道到京報告當地工作現況，並研討新任務之推展方針。工作重點在積極展開敵後之一切活動，包括口頭的、文字的、軍事的、政治的，以加強北伐軍事的聲勢，並造成民衆對革命之嚮往。當時考入黨務學校之尹樹聲、逢化文、宋志先、吳庸祥、王培祐、尹作聖、劉玉德等均係由辦事處聯絡，始能到京投考者。

在此寫一小插曲：某日晨間余正盥洗，張葦村兄前來借錢。適正領到當月津貼十五元，置於桌上，當請其自行斟酌取用。他一看為十元及五元鈔票各一張，即謂：「你給那一張？」余謂：「由你自擇一張好了！」旋詢所用工友姓名為蔣玉祥，乃戲謂：「你與蔣總司令同姓，與馮總司令同名，前途必甚遠大！」

當改組委員會成立之日，正共黨氣焰高張之時。中央既厲行清黨，乃委丁惟汾、于恩波、王子壯、張丕介、王仲裕、崔唯吾、王立哉、葛覃、朱握丹、徐伯璞、張洛書等十一人為山東清黨委員。清黨委員會即派余赴滬，與滬市黨部及清黨委員會接洽，嚴格審查由武漢來滬寧之分子，須覓保方得登岸；尤應注意由武漢滬寧返魯之共產黨分子。

十六年冬，余復奉命以山東黨務特派員名義，秘密返魯，仍負膠東十三縣及青島市黨務督導之責。其他尚有閻實甫、殷君采、葛覃、劉金鈺、張維中、夏雲沛、張丕介、王旭等八位特派員，分區負責全省工作之推行；並互相聯繫，研議各項對策。

民國十七年春，北伐軍曹萬順部克復徐州，人心振奮。山東各黨務特派員為加速軍事進展，造成軍閥內部恐慌，緊急召開會議。決議設暴動委員會，制定暴動工作大綱，據以實施。使成爲一有計畫有步驟之革命行動，藉以壯大北伐聲勢，促使軍閥早日崩潰。

會後，余即懷帶工作大綱多份，以及其他宣傳資料，擬赴益都、臨淄、昌邑等縣，與當地幹部同志作各種行動上的策畫。一日，經過益都車站時，遇益都冀龍臣；其人當時任周村落地稅局長，實爲一軍閥之走狗。余在益都時，曾住族兄子容處，與之相遇而相識，知余爲革命黨員，竟將余之行踪，電告沿鐵路線駐軍，擬於中途拘捕。余由辛店下車，距目的地尚有一段里程，當再搭汽車前去。上車不久，尚未開動，果有檢查人

員前來，追問車上有無王姓乘客。余則裝聾作啞，不予置理。彼等更進一步聲言：有無諸城王姓客人在車上？那時旅行，既無證明，也少相片，只要當面不識，自然很難查清。復以天色不早，衆皆催司機速開車，總算有驚無險。詎料車至中途，忽有人問曰：「你不是王經理嗎？你要到那裏去？」抬頭一看，原來是齊魯書社對面華同紙莊的一名店夥。同行是冤家，狹路相逢，恐無善意，遂以牙痛劇烈爲由，一手托住下顎，一手搖動幾下，表示不能說話。

暗忖此一行程，一再出現惡兆，不得不防。遂提高警覺，於中途下車，步行到一聯絡地點。由董子陵、李興復諸同志協助，先將帶來資料嚴藏，以防有人追蹤。連日召集有關同志，研商如何響應革命軍北伐。並大量印發宣傳資料，以激發農民暴動，打擊北軍士氣。益臨廣三縣邊區，紅槍會組織龐大，此間同志已開始策動，加強聯絡。如果運用得當，將是北軍過境時的一把暗刀。佈置既畢，再輾轉搭火車去濰縣。車上有一位警察，那時稱爲護路隊，猛的挨余而坐，意在稍事休息。但來勢突然，正巧觸及余捆綁文件之腿部，致使纏繞腿上紙張，撲撲作響。一時緊張，心跳不已。即故意忍痛作態，急呼曰：「嗚呀！腿痛得緊，剛貼上膏藥。」那位護路警立刻起身，連聲道歉說：「對不起，對不起！」領首而去，余心始安。

由濰縣去昌邑，正要到汽車站搭車，行經人羣中，突然有人在我肩頭猛拍一把，同時大喊：「果然是你！」余以爲必是被奸細識破，今日當不能免矣。回頭一看，原來是一熟人王會初。真

是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。在昌邑城東北于家邵停留數日。該地區爲于沐塵于觀城等革命同志家鄉，思想文化都開風氣之先，對余所負任務，協助甚力。

然後余再赴諸城、安邱、高密佈置後，逕返青島。即分遣同志梁超、孫鳴階等多人，與各縣大刀會聯絡，無不躍躍欲試。對軍閥部隊之仇視，苛捐雜稅之抗繳，直接間接削弱北方軍隊之士氣與實力，當不在少。

四月間，復以梁超、孫鳴階同志之介紹，再去高密，與警察大隊長李勛臣接洽，勸導其把握機會，棄暗投明。遂於十六日宣布獨立，縣黨部亦公開活動，革命旗幟乃飄揚於此一魯東重鎮。

軍閥部隊在前線上雖然節節敗退，朝夕不保，但在崩潰前夕，仍作困獸之鬪。二十三日，張宗昌所屬膠東防禦司令顧震霖其殘衆，會同各縣警察大隊，合計數千人向我進攻，包圍數重，我守城部隊只三百餘人而已。余乃指派高密縣黨部委員傅子政、單鳴皋、蔡超塵、牛凌漢（字扶霄）、梁超、傅小孟諸同志協助李勛臣嬰城堅守。直至五月十日，縣城屹立如初，士氣亦未稍減。

當時余在高密城裏，忙於策畫城防，團結軍民，外間消息全被隔絕，大局變化，一無所知。事實上革命軍已於五月一日克復省城濟南。由於日本出兵強佔我濟南及膠濟鐵路，阻撓我北伐軍前進，而造成五三慘案。張宗昌所部殘衆全部東撤。並勾結日軍作爲援應，以圖死灰復燃。遂傾全力進攻高密，以謀打通其退路。除以熾烈炮火輪番攻擊外，尚有飛機低空掃射。城中士紳以居民生命危殆，死守無益，乃跪請李勛臣開門迎降。

余發現敵人對高密戰役之成敗，影響其垂死之命運甚巨，勢必不顧一切奪回此城。我方則兵力單薄，後援無繼，經過近月堅守，食糧亦成問題。衡情度力，勢已不可猶豫。想乘夜循城牆逃出。時東門附近大火，明亮如晝，圍城敵軍，齊向城頭發射，彈落如雨，無法脫逃。乃折返同志傅小孟家潛伏。傅家全力掩護，照顧備至，並常託人探視風頭，觀察敵人動態，以謀應付對策。

時軍閥爪牙顧震已率兵進城，下令清查戶口，拘捕異己，李勛臣及縣立中學校長鍾國珍字聘三均已被捕槍殺，以清除革命份子。各城門均派士兵把守，嚴禁出入。正感束手無策之際，忽得悉城內缺水，駐軍將於十五日晨開門，暫准居民赴南河取水。余乃化裝挑水夫，得以混出城外，安然脫險。

此次高密之得而復失，實由於日軍之入侵。若非日本出兵阻撓，我北伐軍於五月一日順利克復濟南後，自必分兵東下，不十日間定可控制膠濟鐵路，而達青島。高密之成爲我軍接應站，自在預計中。人算不如天算，可恨者日寇也。

由高密抵青島，宗潤霖、王錕林、丁振黃、鞠子明等同志多人均以余能死裏逃生，稱慶不已。惟因余在高密策畫獨立，又堅守近月，早已名傳青島，駐軍正在伺機逮捕，衆皆促余速離，免遭毒手。既然如此，不便久停，即急趨大港碼頭，擬搭輪赴滬。經探詢之後，近日內竟無赴滬船隻。於是想改道大連，再轉上海。及向售票員指明航線時，竟被其冷落而嘲笑曰：「你要去大連嗎？那很好，坐這班日本船確有好處！」我問：「有何好處？」彼答曰：「空快！絕對不會擁擠

！我再問：「何故？」彼又解釋：「現在大家抵制日貨，免票都不坐日本船，你卻買票去大連；船上空閒位子一定很多，不空快怎麼！」余聞聽之後，內心非常慚愧，幾無地自容。一位在日本輪船公司服務的中國人，尚有如此愛國精神，余將以何顏相對！因在高密被困因近月，與外界消息隔絕，一心只願速離青島，竟在大港碼頭出醜，心緒久久不安。遂扭頭而去，即使當日有開上海之日輪亦絕不搭乘。衆皆爲余着急，便集資僱一帆船，漂泊大洋，忍受饑餓，數日始抵上海。

深入基層訓練幹部

當余在魯東領導黨務工作期間，中央執行委員第四次會議有整理黨務之決議案。由中央分別委派各省黨務指導委員，辦理黨員總登記、總考查、訓練黨員，健全下級黨部，整理各級民衆團體。十七年四月派于恩波、蔡自聲、李澄之、葛覃、張維中、劉子班、張丕介、王立哉、劉金鈺九人爲山東省黨務指導委員。指導委員會並已接收改組委員會，在泰安成立。蓋省會濟南，時爲日軍侵佔，泰安已成爲臨時省會，省政府主席孫良誠亦將省政府設於此地。

余接電後，即繞道趕往泰安就職。余與蔡自聲、李澄之三人被推選爲常務委員，決策性之問題，由常務委員會議決定；日常工作之推行，則由余負責督導處理。常務委員會秘書爲孟民言，其他職務分配爲：葛覃任組織部長，秘書爲張少峯；劉子班任訓練部長，秘書爲吳若愚；張丕介任宣傳部長，秘書爲宋梅村；劉金鈺、張維中負責民衆運動委員會，秘書爲殷君采。于恩波則以兼

任省政府農礦廳長，未負責黨務實際工作。

嗣李澄之、張丕介、葛覃三人調回中央，另派趙太侖、冷剛峯、駱美奧三人遞補。緣秘書室幹事朱淦中發現宣傳部幹事張大化行動詭秘可疑，加以注意，由其寢室之床鋪下發現油印名爲T·K之小組組織的組織規章，即呈報中央組織部。該T·K小組之負責人發現該小組已被發覺，復改名爲N·M繼續活動。中央即將李張葛三人調回，另派趙冷駱三人遞補。經指導委員會決議：趙太侖任常務委員，冷剛峯任組織部長，駱美奧任宣傳部長。駱並提張金鑑任秘書。

當時黨務甫行公開，工作人員不敷分配，尤以基層幹部最感缺乏。縣級組織之建立，民運工作之推展，以及三民主義之宣傳與發揚，在在需要大量優秀幹部負責領導，展開活動，迅將本黨政策、革命思想灌輸民衆，深入基層。故當前要務，莫重於訓練幹部，培育人才。

魯東各縣，環境特殊，有與省級脫節之虞。乃於五三慘案後之農曆六月，派遣化文、尹樹聲、郭治濱三人潛赴益都，利用第四師範南院舉辦一次爲期一個月的短期訓練班。參加受訓者爲附近二十餘縣之黨工負責同志。雖在日軍不時騷擾之下，仍能針對局勢，把握方向，對革命理論的發揮，工作技術之增進均獲致卓越成效。抗戰期間，臨淄縣長于治堂、益都縣長吳芳亭字笑軒、益都暨臨胸縣長趙國祥字子貞均係該班畢業學員。同年農曆八月，復遵照中央計畫，在泰安開辦黨務訓練所，招收學員一百六十人，爲期六個月畢業。所長由訓練部長劉子班兼任。然六個月的訓練仍感緩不濟急，又於農曆九月，於黨訓所

附設黨務補習班一所，爲期三個月。那時物質生活雖極艱苦，但革命精神卻到處洋溢。學員們在凜烈的風雪之下，受着嚴格的軍事管理。教師熱誠，學員認真，吃住條件的短缺都用精神毅力來補足。使余最感神傷的，是補習班開課一個月後，有兩位學員罹病去世：一爲棲霞的牟恕，一爲諸城的劉玉書。兩同志才二十歲左右，青年有爲，品學兼優，不幸壯志未酬，竟與世長辭，實革命陣容之一大損失。

兩處訓練，均在省黨部附近。名義上雖由訓練部長劉子班兼任所長，但實際上劉氏以染患傷寒病，勢不能主持。乃在指導委員會議提請由余代理。余即於公忙之餘，隨時前往察看兼顧，並分別對各班學員講話。畢業後，均分發各縣黨部及農工礦等工會，指導黨務工作。黨務訓練所畢業學員之在臺者，有尙性初（國大代表）、王俊傑（國大代表）、孫平野（官瑞，二女中教員，已退休）、劉少木（光元，黨工）、褚漢峯（教員）、鍾平山（吉生，教會工作）、孫東屏（行才，教會工作）等。補習班畢業學員之在臺者，有畢圃仙（立法委員）、趙國祥（子貞，教員，已退休）、王泰岫（已故）等。

十八年春，召開全省代表大會，選舉省黨部委員，組織正式省黨部，余以最高票當選。依中央規定，須呈報黨選之加倍人數，由中央圈定。而在大會將結束時，忽有代表提出臨時動議：（一）反對中央規定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代表由中央指定之辦法。（二）建議中央收回省黨部委員加倍圈選辦法，以符民主精神。經大會一致通過。迨呈報中央黨部，以所提動議案不符當前政策，未予

探納。並將指導委員會改組為整理委員會，改派陳調元（當時省政府主席）、劉澍漪、閻實甫、李文齋等為整理委員。指導委員會奉令後，當決議由余負責代表辦理移交。

會日軍撤出濟南及膠濟鐵路，省局恢復。北伐完成，全國統一。六月一日總理奉安大典，由北平移靈南京。靈車由津浦鐵路南行，經過泰安，余仍率省黨部全體同志恭設路祭，向靈車禮拜，默禱此一偉大革命導師，英靈永在。是年秋，將省黨部移至濟南，交代後離職。

反共鬪爭堂兄遇刺

民國十八年夏余在泰安時，辦公時間，傳達送來名片，係王天生（用章）來訪。當時常務委員室秘書孟民言、幹事朱溢中及明少華等均以王天生乃共產黨省黨部委員，今忽來訪，是否別有用心頗應注意，均主張不予接見。我當時並未接納諸人意見，即親自接見。見面後王天生要求到一靜室秘密相談，余即約其到常務委員室隔壁之會客室，請其說明來意。他就開門見山的說：「我今天來找你，是有求於你，也就是希望省黨部能允許我自首。」余即云：「你是共產黨省黨部委員，不要來開玩笑。」他很激動的說：「我是誠意相求。因為在秘密時期，你對我之認識一定很清楚，所以指導委員會有委員九人，我單獨來找你，足見我是誠意的。我自首之原因，係因婚後不到三個月即被逮捕收押，現在放出。回家後，方知我被捕之後家中成為共黨各省黨部委員輪流住宿之處，把我妻子視成娼妓。此種行為，令人難以忍受，所以今天來求你准我自首，以便回

國民黨為黨奮鬥。」余即回答：「我可以接受你自首，但有條件：你必須逮捕共黨委員數人，方能表明心跡，到那時我可提黨務委員會商酌此一問題。」他毅然答曰：「我可照辦，但你必須令省會警察廳隨德功廳長撥便衣警察二十名，聽我指揮。」余當即允許，立刻函濟南市黨部常務委員殷君采，著其照辦。殷君采來信云：「王天生係共產黨省黨部委員，我們撥二十名便衣聽其指揮，如在濟南胡作非為，誰能約束！」余當即覆信：「此是省指導委員會之命令，你只有照辦，沒有陳述理由意見之資格。」事隔月餘，王天生由濟南來信云，已逮捕共產黨省黨部委員尹寬、王孟生、宋悲行、王××四人，是否解送泰安？請示知。余覆曰：「你同殷常務委員商酌，就近收押處理，以免長途解送發生意外。」此時忽接中央委員丁惟汾先生來電，說明王××願自首，請我辦理。余即覆電：王××為何不自首於被捕之前，而自首於被捕之後，須申明理由。丁惟汾先生即派王仲裕親來泰安，要我從寬辦理。余即回答他，請你向指導委員會陳述，此非我個人之事。後經王仲裕各方奔走，最後准王××自首，其他三人均在濟南處決。王××自首後，投身情治工作，抗戰時頗著勞績。勝利後轉任政治工作，數年前在臺病逝。

另有共產黨特派員田裕鳴，於清黨後，由武漢回諸城結婚，為縣黨部逮捕。常務委員趙季勛來電請示是否解送泰安？余即覆電長途解送，恐生意外，希就地收押處理。在清黨時我被推為清黨會常務委員。當時武漢軍校大批學生流浪到南京上海，其中共黨份子甚多。中央清黨委員會段錫朋（書貽）電派余即去上海攔截逮捕共黨份子。余至上海，同警備司令楊虎接洽，方知軍校這些共黨份子事前得到密報，故未到上海，多半由南京附近小站下船，因此未能逮到。凡此種種往事，均在黨工期間反共事實較顯著者。蓋余洞悉共黨不除，必將為黨國之大患。

十九年二月十八日，先堂兄者塾字樂平，後以字行，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邁爾西愛路三一四號寓所遇刺謝世。旋移靈南市謹記路齊魯別墅暨厝。余惘然神傷，不知所措，一則為親情悲悼，一則為國家哀傷。是余自參加革命以來，所受刺激最深的一次。樂平兄係余伯父紀龍公之子，有手足之情；又同為革命奔走，有同志之愛。余於黨的一切活動中，多獲其照顧指導，受益良多。

迨二十二年春，國民黨中央委員暨山東代表一百三十人，為先兄樂平之喪組織公葬委員會，籌備治喪事宜，並商定十月間安葬於濟南千佛山下。當推余蒞赴濟南，成立公葬籌備處，勘察墓地。對墓園之整建，環境之綠化，均能依期完成。使公葬事宜，能按預定時間，於十月十五日由上海齊魯別墅啟靈，經南京下關，於十八日到濟南車站，靈柩轉中央公園停放。二十一日到二十二日上午公祭，下午一時啟靈，由丁惟汾代表中央主祭。在赴千佛山墓地途中，執紼送殯者數千人。從此襟懷宏濶，剛毅奮發之革命鬥士長眠地下矣。（山東文獻七十九年九月出版之第八卷第二期有專文「王樂平先生公葬記」，對王先生生平及公葬經過記述較詳，可參閱。）

青島商品檢驗局長

二十年，余在天津被選為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。二十一年，任實業部青島商品檢驗局長。當時青島有兩家酒精廠，依青島市財政局規定，酒精出售時，每箱應先繳附稅兩元，實已超過成本。故積貨兩年，未能售出。效中央規定：酒精由商品檢驗局檢驗後，即可逕行出售，不再歸市財政局管理。於是兩廠商即託商會主席宋雨亭來洽。伊等以余從事黨務工作多年，經濟情況必極窘迫。希望報請實業部時，只要每箱檢驗費不超過一元，擬各以十萬元為酬。余當告以按檢驗費不超過百分之三之規定，每箱最多只一角而已，不必在法外多所顧慮。並請宋主席轉知廠商，對工業用品之酒精，要切實供應，不可投機取巧，以劣貨抵充蒙混。至於個人之生活得失，廠商不必考慮。蓋盡忠職守，是國家對公務人員最基本之要求；余從不以一己之私，妨害公務。對黨如此，對政亦復如此。

長女遭溺旅途坎坷

三年以來，公私交迫，心緒悽愴，是在革命旅途中，精神最坎坷的一段。二十三年七月，幼女鉢生於濟南。二十四年調任行政院參議。二十五年復轉國民黨中央黨部任民訓部總務處長。

二十六年七月七日，抗戰軍興。當京滬局勢危急時，隨中央撤至武漢。政府已決定長期抗戰，不論敵前敵後，必與日寇奮戰到底。人民流離，生命損失，自屬難免。二十七年民訓部改組為社會部，調充專門委員。

時山東流亡學生，在河南許昌集合，由教育部設國立湖北中學收容安置，由楊展雲先生任校

長，遷湖北鄖陽均縣設校。二十七年三月間，由老河口以民船載運女學生及教職員眷屬，渡漢水，抵均縣，再開鄖陽。長女鈞就讀該校高中部，亦在船中。百餘人同乘一船，人數既已超載，上游又有大雨，江水高漲，水流湍急。船夫警告不宜上行，而學校當局未加注意，堅主開船。不幸中流觸礁翻覆，全部罹難。家人聞此噩耗，悲痛至極。鈞女自幼聰慧，生性乖巧，在校勤學苦讀，成績常列前茅。每念此不幸，深感悽楚。

男兒銘與其姊同讀該校，乘另一艘渡江。及至余攜眷至重慶，銘兒未能同來，內人以爲姊弟同船，必已同遭不測，日夜牽掛，不思飲食。知者爲其證釋，疑念仍難消除。迨二十八年，銘兒由鄂抵川，母子會面，心神始漸恢復。

此時社會部改隸行政院，奉調爲中央黨部秘書處專門委員。初到後方，食住均成問題。後由市區遷至江津縣白沙鎮，始有一安定住所。

銘兒轉入重慶沙坪壩之南開中學。畢業後，原已考中西南聯合大學，其母以該校遠在昆明，路遙山險，放心不下；復以余已返魯，學費之籌措亦非易事；堅不允其前往註冊。適中央大學單獨招生，再以王金名之名義考中該校歷史學系。在戰時首都，敵機不斷轟炸下，順利畢業，亦屬幸運。健女就讀白沙之國立女子師範學院，幸亦不負所學，爲日後從事教育工作奠定基礎。幼女鉢，時年尚幼，讀小學。往返坡陵，砂石絆腳，恒手提斷帶之草履回家，嚷着母親爲其挑出足掌之棘刺。孩童無知，但已深受戰亂之苦矣。

回山東組省參議會

時至二十八年，抗戰方殷，國際又多姑息觀望，就整個戰局而言，已進入相當艱苦的階段。但敵後游擊力量崛起，深符全民抗戰的長期政策。敵人所謂佔領區，只是幾個城鎮據點和幾條交通線而已。其所推行以華制華，以戰養戰的策略，幾已全部失敗。此時余所任之專門委員，並無積極性的任務，亟思乘機返魯，爲桑梓効力，亦爲中央分勞。於是青年團中央團部派充山東支團部幹事，戰地黨政委員會派爲魯蘇戰區分會委員，中央組織部亦委充山東省黨部委員，行政院更任命爲山東省臨時參議會秘書長。適同年（二十八年）三月間，中央訓練團成立，奉調參加黨政班第一期受訓。結業後，蒙團長蔣公召見，詢以「山東黨政情形，你是否明瞭？」余答以「明瞭。」並即陳述此次奉命返魯，政治任務較爲重要。爲免事繁力分，顧此失彼，乃向蔣公面辭黨團兼職，當蒙嘉許並諭允。

余之山東省臨時參議會秘書長職務，係二十八年任命，直到三十年十一月始返抵魯南山東省政府所在地。費時兩年，其原因與經過，恐非局外人所能盡知。按參議會之組織及召集，依行政院之規定：先由行政院任命參議員若干人，再由參議員中任命議長副議長各一人，復由議長推薦秘書長一人，由行政院任命。由行政院頒給參議會印信一類及官章三類（議長、副議長、秘書長各一類）。然後由秘書長會同省政府召集會議，並由秘書長呈請議長副議長到會主持會議。由籌備到開會之期間，一切用人行政及經費開支等，由秘書長完全負責。

山東之情形則不然，毫未遵照行政院之規定

辦理，完全由議長孔繁鸞字雲生先生包辦。經費完全由其具領，交其自用之人員保管，我這秘書長無權過問。對於眷屬之安置，亦只顧其個人，至於秘書長及其他人員則概不聞問。總之，孔議長所注意者，只是人事與經費。至於法令規章之蒐羅，作業程序之瞭解，必須多方諮詢，尤其在淪陷區內實施首創之民權，責任重大，不能稍有疏失。凡此均由余分向諸多有關主管機關及人員訪問請益。

由於議長之專擅，罔顧法令，致準備工作多不能配合，直拖到三十年五月始得由渝起程返魯。經成都，越秦嶺而達寶雞，轉西安。在西安有許多同鄉及友好分別歡迎，並商酌赴豫皖之行程路線。直到中秋前後，方輾轉到達皖北之阜陽，我九十二軍李仙洲軍長之駐地。

安徽阜陽距敵入交通線較遠，地理形勢特殊，成為淪陷區與大後方的聯絡中心。但距此行目的地，尚有隴海津浦兩鐵路間隔，敵偽密佈，共匪竄擾，仍須與當地游擊部隊及有關單位切取聯繫，繞道而行，免作無謂之犧牲。幾經研商，余以十七年省黨部在泰安時，一年多時間，市民大會多由余主持；而濟南又係余在黨務秘密活動時期作業數年之地，認識之人必多，勢不能經過諸地。故決定隨從五十一軍領取彈藥款項之部隊同行。孔議長則率同秘書王雲浦化裝乘火車經徐州、濟南轉魯南山區省政府所在地。

余抵阜陽時，適聞余侄金石及劍二人在魯南考入陸軍官校西安分校，隨軍赴西安報到，亦到達阜陽。余即匆忙趕到其駐地，彼等則已出發，未得相晤，悵然久之。後二人均為國捐軀，英年

早逝，傷哉！

余隨軍行進，甫離阜陽，共黨匪徒竟沿途張貼「歡迎五十一軍領彈藥返魯抗戰」之標語。日軍及共產匪軍即按標語所示地點，沿途截擊。致行軍一月有餘，未能越過隴海鐵路，不得已折返阜陽。

時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成章先生奉令赴渝述職，過隴海鐵路時，遭日軍追擊，下落不明。李軍長仙洲奉令搜尋，而所派之鄭仲平、楊沛如二兄均與沈氏不相識。於是同人等公推余前往蕪陽、蒙城一帶尋找。經多處搜尋，幸在渦河河灘找到，沈先生躺臥河灘沙中，已昏迷不醒。經喚醒後，即興奮抱余而泣曰：「真想不到你老兄會來找到我！」情緒激動，久始釋手。遂即乘馬送到阜陽李軍長處。來臺後，沈先生寓居臺中，當其八十壽辰時，余前往祝賀。在照相時，伊首先邀余共照，曰：「倘非王先生在渦河將我找到喚醒，那能有在此與大家歡聚之機會，極應共照以爲紀念。」

時適山東省政府秘書長兼民政廳長（代理主席）雷法章兄派秘書祝廷琳兄來阜陽迎接。祝秘書對沿途情況頗爲熟悉，余乃脫離五十一軍部隊，化裝隨祝秘書單獨行動，徒步經皖北、豫東、魯西而魯南。沿途數經敵偽軍扣押，並曾分別刑詢。至十一月到達魯南新編第四師吳化文部于團長懷安之團部所在地，始到安全地帶。吳師長亦派員來接，內有余姊丈王孝甫及徐孟儒二兄。沿途之艱險及苦痛，決非言詞筆墨所能形容，尤非身受者所能體認。

到達魯南沂蒙山區之省政府所在地後，迭經

與黨政軍各方面多次研商。對於參議員之產生標準，區域劃分，人口比率，職業範圍等均應全盤顧到。但因地理環境特殊，人事意見各異，調和說服，煞費周折。其中山河交錯，晝夜兼行，遇有敵人出動，更要東藏西躲，意外延誤，自屬常事。經此更番努力，各方大力協助下，省參議會終於三十一年春集會成立。

開會二十天，討論決議案多起，對於加強黨政軍聯繫問題，以及省政改革事項，建議頗多。並選舉傅斯年、范予遂、劉次簫、王仲裕、孔令燦爲第三屆參政員，代表山東參加中央之國民參政會。並選舉閻實甫、劉幼亭、尹漁村、趙季勛、劉民生、翟臨莊、郭金南十一人爲駐會委員。只以各委員多散居各地，且均另有工作，相聚機會仍少。無論縱的溝通，橫的聯繫，隨時需要遠道奔波，交換意見，以達成上級交付之各項任務。此一民意機構之組成，限於環境與現實，雖不能謂爲如何理想，但戰時各省，無論在淪陷區或是大後方，能成立參議會，並產生功能發揮作用的，山東當稱第一。無怪參議會成立開會之報告到達行政院後，陪都各報爭相刊載，大加稱讚。而當時任中央黨部秘書長之吳鐵城先生，於余返抵重慶時，更面致嘉勉。身與其事，慰藉良多。當時山東省政府及魯蘇戰區總司令部均僻處魯南沂蒙山區，而共產匪徒亦以此山區爲屏蔽，混淆打擊我軍政機構。更橫生奸計，挑撥離間，致軍政要津，嫌隙叢生。又游擊部隊與正規軍亦多齟齬，而游擊部隊之間，更多甲乙不能相容。余爲協和軍政意見，加強抗戰力量，秉承駐會委員決議案，常不顧山路崎嶇勞頓，環境艱困險惡

，爲之排解斡旋，頗耗心力，但所獲效果不彰。三十二年春，奉命兼任山東省政府委員，方期以人地兩熟之便，協調各方，繼續爲桑梓效勞；不意三十三年忽奉行政院電召，赴渝述職。抵渝後，除向當局報告魯省政府及魯蘇戰區撤出山東後，魯南山區我軍政活動情形外，即藉便辭卸山東省參議會秘書長職。復承吳鐵城先生關照，回任中央黨部秘書處專門委員。

國民參政會參政員

三十四年，山東省參議會推選余爲國民參政會第四屆參政員。該會係國民政府於訓政時期，鑒於七七事變，全國一致對日抗戰，制憲工作因而展期。乃於二十七年爲徵採全國國民公意，設立國民參政會，爲戰時之中央民意機關，協助政府促成憲政。參政員總額一百六十人，其中一百五十人由各省市分別選出，其餘十人，由國民政府聘任之。每年開會兩次。今已爲國民代表大會所取代。是年秋，抗戰勝利，全國歡騰，衆皆準

備復員，人事變動特多。三十五年，余亦隨參政會遷京。

第四屆國民參政會，前後共開大會三次。會前自必妥爲準備，慎加籌思，更須徵詢省內各界意見，廣集有關資料。對中央之政治軍事教育，許多興革事項，以及有關山東政治、教育、賑災、救濟等問題，均針對時弊，詳述案由，必使大會樂於接受，付諸實施。尤其在第三次大會時，余提案組織接收清查團，分區清查接收人員辦理接收情形。在進行討論時，堅持甚久，終由大會一致通過。在清查團着手組織時，秘書長邵力子當面徵余同意擔任豫魯青島團團長。余以提案原意，在清查接收人員之良窳，以澄清社會之輿論。個人不但不接受團長任務，且不參加任何一清查團；並提請郭仲隗先生任魯豫青島團團長。在本次參政會開會期間，忽承蔣委員長召見。說明據吳秘書長鐵城先生報告，以余此次回魯工作，幾經艱苦奮鬥，不辭勞怨，在淪陷區內，終將山東省臨時參議會成立開會，實爲不可多得之事功。除面予嘉獎外，並頒賜勝利勳章一座。

第四屆參政會在渝開會時，有一插曲可以一記。某日有廣東參政員提案，請參謀部將廣東省北江一帶之武裝共匪三千餘人，遷往山東煙臺一帶。余當即起立大聲疾呼，誓死反對。而廣東參政員劉荷靜竟起立說明：「據他瞭解，共產黨對民衆非常友善，如借用器具，必先刷洗乾淨，再行送還，並千謝萬謝。」接着劉次蕭先生起立發言：「劉參政員根本不認識共產黨爲何物，實爲口蜜腹劍之毒瘤。果如劉參政員所說之友善，爲何不留他們在廣東，而要求遷往煙臺？」對方語塞，遂將該案擱置。山東同鄉，尤其是魯東人士聞之，均謂「打了一個小勝仗！」

在此期間，次女鍵經舍弟景羊之介紹，與其受業學生張連均結婚。張君國立政治大學畢業，任職農民銀行。幼女鉢在中華女中就讀，余以公務繁忙，經常由其姊照顧。

三十七年五月，行憲政府成立，國民參政會結束，余復應聘爲行政院參議。（未完待續）

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

第一、二、三、四冊出版
合售新台幣貳百捌拾元

江蘇耆宿、前上海米業、雜糧公會理事長、農會理事長萬墨林，出身寒素，閱歷閱富，自少年時期即爲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，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祕的奇聞異事，萬氏莫不親身經歷，耳聞目覩。抗戰八年期間，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，驚險場面，敵僞內幕，歷歷如數家珍，又復兩度被捕入獄，飽受酷刑。七十歲以後爲中外雜誌撰「滬上往事」，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笈，當代奇聞和盤托出，極獲中外讀者重視。現已將第一、二、三、四冊全部出版。



①王立哉(右)早年與孫運璿(右四)、劉安祺(右五)、楊寶琳(左三)、朱正宗(左)合影。

②王立哉(右二)與程德受(右)、鍾皎光(左二)巡視高考試場。





①王立哉(中)54年與考試委員同遊橫貫公路在梨山合影。

②王立哉(左)與莫德惠(中左)、王雲五(中右)等合影。

